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

郑 飞 赵瑞泽

[摘要] 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历史价值。资本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社会交往程度，但这并非资本的本来目的，只是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两个结合”基础上的伟大创造，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才能真正地“驾驭资本”。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 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资本的文明作用 资本文明悖论

党的二十大作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战略部署^①，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为破解“资本文明悖论”开辟了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②。针对如何发挥资本作用，强调“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③。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使资本能够而且应当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这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虽然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往两大层面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但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④，其文明作用不过是服从于这一目的之客观效应。“资本文明悖论”根源于资本的二重属性，作为生产要素的文明属性，只是作为生产关系的增殖属性的附庸。唯有实现社会关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5年度重点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研究”（2025XYZD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

系的根本性变革，方能破解这一文明悖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更加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作用，是在“驾驭资本”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一、“资本的文明作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传统文明形态的超越

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历史价值。在世界史、欧洲史的叙事框架内，“公元1500年恰当地象征着现代的来临”^①。这一界划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更在于区分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形态。“公元1500年”的古今之别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观念、历史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本创造了丰沛的物质财富，开辟了现代世界体系，使普遍的交往和联系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②，“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③。资本的“文明化趋势”（civilisirenden Tendenzen）和“伟大的文明作用”（the great civilising influence）^④，皆以拉丁语“civilis”为词源，以城市化、社会化与公民化为基本特征。马克思凭借“从后思索”的方法，认为一切传统文明形态“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⑤。他高度肯定“资本的文明作用”，并冠以“伟大”的称谓，充分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历史价值。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

（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社会生产力指向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马克思指出，“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⑥。在传统文明形态中，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对自然持依赖态度。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⑦，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飞速提升，逐渐开始支配与控制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反转，两者的

① [美] 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下），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④ 参见 MEGA2 II/1.2, 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57-58 Teil 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1, S. 326, 322.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地位发生结构性颠倒。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中，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都被摧毁。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通过机器这一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实现了以机器代替人力的工业革命，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更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过去近一个世纪所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和丰沛物质财富。纵观人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资本的文明作用”之核心内涵，为新的文明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

社会交往指向生产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类活动的范围和联系的紧密程度。在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类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管理与统治主要依赖于家庭、部落等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资本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局限性，“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马克思将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视为衡量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纵观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史，社会交往的普遍化是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推进的：从主动方面来看，资产阶级为拓宽销路、扩大利润，必定会积极主动地开辟世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联系；从被动方面来看，资本裹挟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趋势不可挡，“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并按照资本逻辑不断形塑着世界的面貌，导致诸多民族和国家深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③的两难境地。社会交往日益普遍，终结了各个民族和国家孤立发展的历史，开启了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使人们能够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为创造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提供了条件。可见，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是“资本的文明作用”之重要维度。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整个世界日益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资本的文明作用”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证关系

具体而言，“资本的文明作用”聚焦文明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侧重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内容”，关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文明发展水平、社会交往发展程度等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聚焦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状态，侧重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形式”，关涉主导性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特定经济基础和特定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等问题。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于：“资本的文明作用”作为普遍存在于任何现代文明形态中的“物质内容”，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基础要素；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则以其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形式”，塑造并支配普遍性的“物质内容”。这种特殊性意味着，一旦资本主义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关系的主导地位发生改变，“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便会发生历史性分离，从而使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然而，由于历史感的缺乏，形形色色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终结论”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神圣化、永恒化和范式化，甚至错误地视其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形态”。与之截然不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视为“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基于“资本的文明作用”普遍性“物质内容”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特殊性“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提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

二、“资本文明悖论”引发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

资本无限增殖必将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趋于对抗，引发系统性的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资本的文明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否定性力量。虽然资本在发挥其文明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社会交往程度，但这并非资本的本来目的，只是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深度剖析，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②。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交往日益普遍不过是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伴生效应，且须在根本上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在价值增殖驱使下，资本必将毫无限制地攫取自然界的全部资源，把人类置于“异化”的生存场景之中。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并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文明比较研究中的认定，反而将所有人与物纳入同质化的工具理性之中，把文明“悖论”推向极致：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社会化大生产，必将触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临界点，引发系统性的自然危机；另一方面，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关涉人与社会的关系，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③，必将触及社会共同体认同的临界点，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可见，“资本文明悖论”根源于资本的二重属性，资本在发挥文明作用、塑造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明悖论彻底暴露出来。

（一）自然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加剧

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类对自然的看法不再是接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人类在科学知识领域对待自然的态度彻底应用到生产领域，运用人类知性“为自然界立法”。在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类敬畏自然、依赖自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锐。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社会生产力在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中迅速发展，大量生产往往与大量污染相伴。劳动过程始终受到价值增殖过程的支配，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不断促逼人类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抗。相较于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自然生态环境有其固定的承载阈值与界限。资本对这一自然界限的挑战，不仅干扰到自然生态的循环，还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将资本增殖作为目的，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的循环结构，将之转化为单方面的榨取和滥用，使自然生态仅仅沦为资本增殖的‘无生命’的手段和工具”^①。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满足资本的价值增殖需要，使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极度恶化，日益成为人与自然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社会危机：人与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加剧

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社会危机集中表现为个人生存性危机、社会秩序性危机和世界冲突性危机。首先，是个人生存性危机。以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曾希望人们通力协作构成一股“合力”，以订立“社会公约”的方式应对多样化的社会危机^②。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并未实现人们通力协作的美好愿景，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生产资料不断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其“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③。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难以调和的矛盾，劳动力与资本在形式上的“自由”交换，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对雇佣劳动者的强制性权力。这些出现在市场上的劳动者，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自由得一无所有”^④。普遍的生产强制、竞争强制，不断加剧着普遍性的生存焦虑，使普罗大众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世界中，陷入无根漂泊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称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⑤。其次，是社会秩序性危机。价值增殖的无限性，不断加剧社会关系的对抗，威胁到社会生态的健康运行。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抗，未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得到解决，反而以愈发多样的形式迸发出来。最后，是世界冲突性危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文明维度之间的联系普遍加强。这种不断强化的联系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该体系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中心，建立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体系上。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奴役空前激化了文明世界的分隔与对立，一度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对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权力支配关系。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全球拓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单向度的全球

① 郗戈、荣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习近平关于“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化”，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不断再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复制并不断扩大着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支配关系，对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创伤，使它们饱受社会冲突与动荡之苦。

从唯物史观的历史大视野来看，“资本文明悖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否定力量，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则成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发挥的外部桎梏。在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狂飙突进的历史背景下，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对人类文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美国学者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中，披露了根植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不平等、失业、过劳、贫困、经济动荡、环境退化和民主缺失等七大难以克服的问题，强调寻找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替代物的紧迫性^①。事实上，施韦卡特列举的七大问题都没有离开马克思意义上“资本文明悖论”的问题域，马克思对人类文明理想形态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早已给出了施韦卡特问题的答案。“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唯有扬弃资本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与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现实的人”的能动活动。马克思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③。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类存在方式变革和人类文明形态跃迁来看，上述三种社会形式分别对应着传统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文明形态。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退场，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文明形态逐渐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

（一）资本主义文明：物的依赖性

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虽具历史进步性，但其“物的依赖性”本质却导致人的物化与文明畸形。传统文明形态基于“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自然或历史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在传统文明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④，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采取某种联合起来的方式共同抵御外部自然，个人的发展严重依赖、受限于共同体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基于“人的独立性”，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显示出

① 参见〔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黄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7-1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这种“人的独立性”需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而是一种片面的、虚幻的、畸形的独立性。“物的依赖性”依托于普遍的市场交换，“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①，但社会关系的日益普遍化并没有孕育出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而是蕴含着“物化”。“人的独立性”表面上呈现为个人自由、平等、独立地作为市场中的“单子”参与到交换之中，“独立的个人”是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裂进而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外在表现^②，最终淹没在资本的“物化”表现形式之中。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无序型和管控型之间“轮回”，恰恰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未能找到破解“资本文明悖论”的有效途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势必要求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二）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类文明在扬弃资本统治过程中走向自由全面发展，通过破解“资本文明悖论”迈向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扬弃资本统治既不是对文明的抽象否定，也不是对历史的终结，而是对“资本文明悖论”的破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的文明面”^③，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④。人类文明理想形态的实现，必将经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但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正在穷尽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断突破外部界限，一次又一次地演化为无法遏制的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加速自身的消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划分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⑥；而高级阶段则通过积极扬弃资本统治、重新占有生产资料、极大发挥个人才能，推动“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⑦，实现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物质生活与自主活动的统一。无论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均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对抗形式”，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属于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② 参见郗戈、向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及其内生性探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③ “资本的文明面”（der civilisatorischen Seiten des Kapitals）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表述，从词源和内容上来看，其与“资本的文明作用”是同义语。参见 MEGA2 II/15,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4, S. 794.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及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作为本质规定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两个结合”基础上的伟大创造，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赓续中华文明的根脉，继承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精神，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转化，落实了《论语》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之伦理，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治理体系，回应了《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传统，在传承中不断赋予中华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吸收现代文明有益成果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广泛吸收借鉴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文明形态通过重构社会生产关系，使资本从“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回归“服务人”的要素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文明进步与人类解放的内在契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一运动的当代中国实践，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从“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历史性超越。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国积极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自信开放的姿态，为全球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性，坚持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创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诊断并没有过时。尽管资本主义曾创造出丰沛的物质财富，但其文明悖论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失衡、生态危机及社会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践。”^③ 从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贯彻新发展理念到推动“AI+”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1页。

科技创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推动全体人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使命。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阶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①。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作为本质规定性。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终将迈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自由王国”。其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时代走向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②。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基于对“资本文明悖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揭示了一条通过变革社会关系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破解“资本文明悖论”、实现“文明历史超越”，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科学回答了如何“驾驭资本”

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回答了如何“驾驭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③历史上，“资本的文明作用”构成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今天，这种文明作用同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才能真正地“驾驭资本”。“为资本设置‘红绿灯’”^④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阐发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驾驭资本”，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属性的控制与利用。在发挥资本生产要素的文明属性，助推文明发展之时，开“绿灯”；在遏制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增殖属性，陷入文明悖论之时，开“红灯”。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驾驭资本”，就是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3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6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6页。

秩序。有所为，就是要完善和遵守市场规则、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建设公平竞争的全统一大市场大舞台；有所不为，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生产要素属性的结合，使得资本不再沿着价值增值的路径野蛮生长，而是沿着有序发展的路径不断向前，专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社会交往程度。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文明属性从属于其作为生产关系的增殖属性，导致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性地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文明属性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对抗形式”，在文明塑造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驾驭资本”是为了最终能够“消灭资本”，资本终将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退场而逐步消亡，人类文明也终将迈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的“驾驭”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民营经济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引导民营经济，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达成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推动人类文明向创新、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占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不仅带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也催生了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为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公平正义为导向，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家厚植家国情怀，饮水思源、富而思进，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者。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的“驾驭”，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了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社会责任，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激发了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二）实现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资本增殖为单一目的取向，造成物质文明的单向度统摄，而其他文明维度则处于依附从属地位，各文明维度紊乱失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横行，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发挥了“资本的文明作用”，而且推动了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多维文明向度的协调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这种“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相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资本限制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范围之内，实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资本的“驾驭”。其二，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人

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破除了三大拜物教造成的人的精神世界“物化”及单向度发展的局限。其三，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社会文明建设相协调。人类文明新形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克服资本无限增殖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分裂对抗，利用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强化社会保障，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其四，实现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 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生态文明理念寓于价值生产和财富创造之中，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观念嬗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系统观念，在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是立足新的历史阶段进行的开拓与创造。

（三）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超越，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以社会主义作为本质规定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破解“资本文明悖论”开辟了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反思，秉持开放包容，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摒弃了资本主义为实现资本永续增殖而编造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终结论”等一系列虚妄神话。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远意义在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代生命力，开创了文明演进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为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奠定了文明根基，昭示着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

（郑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研究员；赵瑞泽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应帅]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3页。